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刘宋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7

ISBN 7—80199—433—7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
主义革命—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国际
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6—53 ②D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292 号

书 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贾京玉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0.5

印 数:1—1200 册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433—7

定 价:2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目 录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孙 英/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幕词	谷安林/4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的报告	黄修荣/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总 结	黄修荣/18
试论苏联、共产国际早期对华工作重心的转移 ...	肖 姓/22
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 “进攻理论”	张喜德/41
国民党改组的若干历史问题再研究	吴明刚/5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	董志铭 方文群/70
共产国际与国民党——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共产国际与国 民党相互关系的某些观点 ...	H·П·玛玛耶娃 孙艳玲 译/82
试论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	沈建中/104
孙中山与国民党、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	

根据地	H·U·梅尔尼科娃 徐锡岩 译/119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曾成贵/133
布留赫尔——1924—1927 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参与者 (新文件材料)	卡尔图诺娃 陈 鹤 译/155
试析国民党二大前共产国际、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 斗争的策略演变	李 颖/168
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信任及其政策失 误	蔡 丽/188
大革命时期苏联对冯玉祥的援助及其效果	苏 杭/206
关于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责任的再讨论	周利生/220
北伐期间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和大革命的失败 ...	王德京/231
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左”倾理论与右倾指导	罗重一 万 玲/248
关于 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点 思考	张秋实/273
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及对中共的最初影 响	李 蓉/287
负责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1920—1931 年)	И·Н·索特尼科娃 李 颖 译/307
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富田事变——以《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为基础的探讨 ...	王志刚/319
后 记	332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4年9月24日)

孙 英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我非常荣幸地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欢迎大家参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大部分是以文入会的中俄专家和学者，还有一部分是特邀的中俄知名的历史学家。各位都对这个领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你们有的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中国，有的不远千里从外地赶来北京，大家相聚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一定会加深对这个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和许多历史经验的认识。作为东道主，我预祝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回顾这段历史，深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总结好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巩固政党之间的新型良好关系，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有十分有益的。

自20世纪的后期以来，两国的历史学家着手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较

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随着俄罗斯方面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布和两国学者对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利用,这个领域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建立了友好合作和深入交流的密切关系,共同促进了这个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就是双方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双方加强友好合作的一个重要体现。

下面,还请允许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情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研究机构,负责相关的工作。下设三个研究部和一个科研管理部。第一研究部负责研究1921年至1949年的党史,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第二研究部负责研究1949年至1978年的历史,也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第三研究部负责研究1978年以后、也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科研管理部负责科研项目和学术交流活动的管理协调工作。

我们还有三个专门机构:一个是政党政治中心,主要研究外国政党的一些问题;一个宣传教育办公室,负责中共党史的教育与宣传;一个是资料征集办公室,负责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杂志社——《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一个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们这个研究室共有工作人员约200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也就是教授、副教授51人;有博士13人,硕士56人,学士63人。20多年来,我们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共党史的专著和论文,还与其他单位合作拍摄了一些专题电视片。我们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简史》等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秋天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再过几天就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以及共和国 55 周年华诞。鲜花装饰着整个北京,人们沉浸在快乐喜庆的气氛中。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再次祝愿这次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在北京健康愉快;祝愿俄罗斯朋友在北京与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快乐与欢庆。热忱地欢迎所有的朋友今后保持与我们密切联系。

谢谢诸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2004年9月26日)

谷安林

女士们、先生们：

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要闭幕了。请允许我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致词,热烈祝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在座的中外专家学者热情参加这次学术研讨活动,积极交流学术研究成果,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之情。

正如会议开始时,孙英主任所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我们不断研究的重大课题。应该说,1978以来,中国众多的学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新收获,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编辑的12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相继出版以来,由于有新的史料的公布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化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这次研讨会的举行,至少提供了一个平台,交流了大家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并从诸多方面开展了深入的讨论,这必将进一步促进这个重要课题研究的

深入,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发展意义和现实意义。会议的成功,是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真诚地向大家表达我们的谢意。

在这次盛会闭幕之际,我们还想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就是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问题,中外学者继续进行深入的研讨,并采取多种方式,相互交流新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单位,一直保持很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我们之间学者往来频繁,亲切友好。希望这次研讨会后,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求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通过这次会议,中方学者相互之间也认识了,沟通了,得到了启发,开阔了视野。在这里,我对中方学者也表达一个愿望。今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到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的高度。前不久,中央又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努力学习贯彻中央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消化已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注意改进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这个课题的研究,取得优秀的研究成果,进而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以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过两天,就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国庆节也将随之而至。研讨会闭幕后,欢迎大家在北京多逗留几天,与我们共度美好的节日。

最后,我代表孙英主任和我的同事们,衷心地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幸福,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谢谢大家!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黄修荣

女士们、先生们：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多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与共产国际、联共(布)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开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深入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过去由于档案资料有限,我们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憾。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开始编译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迄今已出版12卷,其中收录近年由俄罗斯公布的1920年至1931年的珍贵档案文件886份。这批新资料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促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这批档案资料公布之后,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在我国相继问世。这些论著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的总战

略到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实施;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华政策的得失到它们对国共两党所产生的影响;从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到其驻华代表之间的矛盾等等。总之,研究的范围几乎包含了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方方面面。

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在充分吸收和运用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和对原有史料再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二,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新的视角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注意到对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又注意到对方针、政策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涉及的方面很多,限于时间,请允许我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列宁曾经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①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

^①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8页。

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从理论上、实践上积极帮助的结果。在苏俄援助下国共携手进行国民革命,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项战略决策。这项决策来源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帝国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敌人。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结成一条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下,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然而,他们起初对中国政治势力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尤其是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缺乏全面的认识,所以一度准备联合吴佩孚和陈炯明。从1922年夏开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从马林、越飞等驻华代表的报告中,才逐渐了解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真实情况,从而开始考虑与孙中山联合,促使国共进行党内合作。

最早提出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1921年12月,马林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接触后,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与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间去进行政治活动。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这样做,其前景是暗淡的。^①对于国共合作,孙中山是赞成的。但他不同意与共产党平等联合,只同意“容共”,即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马林根据自己在印尼的工作经验,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于1923年1月作

^① 参见《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国共合作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中共成立后，在一段时间内对国民党等其他党派是采取排斥态度的。1922年春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策略时，包括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内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之后，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回到国内，传达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受启发，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1922年6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党提出了革命的最低纲领，并依据此纲领作出与中国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这表明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

由于孙中山反对党外联合的方式，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领导人于1922年8月在西湖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同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斗是难以战胜强大敌人的，从而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以决议的形式确定全体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使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事实充分证明，国共合作的决策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倡导和促进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它们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有意或无意地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追随者的地位；它们在制

定对华政策时过分强调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过分注重利用和加强国民党的实力,而对如何扩大共产党的力量重视不够,从而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二)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由于当时的世界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国际条件不利于中国革命;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反动力量还相当强大,远远超过了革命力量;是由于革命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在主观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知道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是由于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当时人民群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水平还不高。

同时,对中国共产党有指导全权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斯大林等人只有领导和参加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无领导和参加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经验,这是他们指导中国革命的先天不足之处。另外,他们远离中国,对于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革命形势无法及时把握,只能依靠现在看来并不先进的通讯方式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再加之其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加伦等,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所以要斯大林等人在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比如,在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上。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前,共产国际、联共(布)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好感,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布)使团领导人布

勃诺夫没有对蒋介石组织有力的反击,而是将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罪于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3月24日,布勃诺夫在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对顾问们的工作给予了严厉批评,指责他们在五个方面犯了错误,要求顾问们今后只能“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①。3月27日,布勃诺夫给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出: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时“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②。

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等人虽然已经看出国共继续合作下去会障碍重重,但仍然作出如下决定:“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他们仍将蒋介石看作左派,决定共产党“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③。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得手后,又提出整理党务案,企图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岗位。然而鲍罗廷为了贯彻联共(布)中央向蒋介石让步的指示,还是同意了整理党务案,并且许诺将苏联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洋洋自得地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④

①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24日于广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注:本书各篇论文注释中引用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3、4、5、6卷都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② 《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于汕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84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2号(特字第16号)记录》(1926年4月29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36—237页。

④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42页。

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后,又说服当时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成员接受整理党务案。^①在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当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时,由于鲍罗廷事前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没有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结果使整理党务案在会上得以通过。北伐开始后,鲍罗廷已经看出蒋介石的独裁野心,但他认为在北伐时期不能反对蒋介石,只能等待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自取政治上的灭亡。

四一二政变前夕,陈独秀向莫斯科报告蒋介石将制造反革命政变,希望莫斯科支持他与蒋介石进行斗争。然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下了这样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什么不主张反蒋呢?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③然而可悲的是,在斯大林讲过此话才七天,尚未被他榨干的柠檬——蒋介石就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① 张国焘回忆说:“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廷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20页;另据蒋介石日记载:5月14日下午,“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87页。

②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③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27年4月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